

❖ 《春秋》之谜 ❖

刘黎明
巩红玉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1 年·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之谜/巩红玉,刘黎明著.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0

(四书五经文化风云)

ISBN 7-5408-3447-1

I. 春... II. ①巩... ②刘... III. 春秋-研究
IV. 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29078号

责任编辑:王积跃

技术编辑:王凌

封面设计:周靖明

责任印制:吴晓光

“四书五经”文化风云

《春秋》之谜

刘黎明 巩红玉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610012)

印刷厂印刷

(邮政编码:)

2000年10月第一版 2001年10月第二次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12千

印数:1001— 册

ISBN7-5408-3447-1/I·30 定价: 元

*

*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四书五经”文化风云
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屈小强	刘黎明	李殿元
编	委	胡邦炜	谢芳琳	王定璋
		王成儒	赵 文	杨 梅
		巩红玉		

总序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组嵯峨雄浑、高峰迭起的巨大山脉。它横亘东方，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中惟一不曾中绝而绵延五千年。中国自古又有“声明文物之邦”（声，指语言、音乐；明，指光彩、色彩，包括服装、绘画；文，指文字、文法、文体、文学、文献；物，指经人类加工过的物质）的盛誉，仅以其中文献一项而论，就浩如烟海，令人叹止。但是，由于历史沧桑的冲击，岁月风雨的洗礼，这片文献浩海却留下许许多多的秘事悬案，有如雾罩云漫，扑朔迷离。这之中又尤以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最显赫、最具影响力的《四书》、《五经》为突出。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至南宋由大儒朱熹汇为一集并加注释，是为《四书集注》。《五经》指《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始称于汉武帝时期。《四书》、《五经》一直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最基本的教科书，而且也是元明清三代六百余年科举考试的惟一题库，是二千多年间中国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至上经典。对于这些经典，早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专门的“传”、“记”进行诠释阐发，从而形成所谓经学。经学伴随着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走过了起伏曲折的里程，产生出众多流派，发生过无数噪动一时的大论争，以致聚讼纷纭不断，莫衷一是难清。

比如，《周易》是怎样形成的？其成书年代如何？作者是谁？名称该怎样理解？它何以被尊为“六经”（《诗经》、《尚书》、《周易》、《礼记》、《乐记》、《春秋》）之首？到底属儒家经典还是道家经典抑或自成一家？它到底有多深的文化意蕴？为什么从汉至今各方人士一直都对它倾注热情，竟形成一道洪波迭涌、风景独好的《周易》热线？北京古城是按照《周易》构想建立的么？

又比如，何以有古、今文《尚书》以及伪古文《尚书》之别？为什么说《尚书》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第一部信史，所记尧、舜、禹三史基本可信？孔子何以要盛赞《尚书·尧典》？为什么说尧帝新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后人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会进入《十三经注

疏》的殿堂？东晋梅赜为什么要作伪、献伪并能蒙骗世人达一千三百余年之久？

再比如，如何看待《诗经》的阶级属性与社会功能？孔子为什么要说不学《诗经》便无法与人交谈（“不学《诗》，无以言。”）？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今文诗学与古文诗学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周颂》和《大雅》恰巧会与上古世界四大诗篇（印度《黎俱吠陀》、以色列《希伯来诗》、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时产生、并肩媲美？刘勰为什么要把《诗经》与《书》、《易》、《礼》、《春秋》并列为“文之枢纽”？涂山女所唱巴歌何以会成为“南音”之始且为《诗经》“二南”（《周南》、《召南》）所效法？

.....

类似这样的富有意义、富有魅力的问题欲理还乱，数不胜数，一直盘绕在《四书》、《五经》的里里外外，蔚成一种波诡云谲、气象万千的文化景观，可谓匪夷所思，令人流连。而作为这种奇异景致的主角们（指《四书》、《五经》里外所牵涉的各式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的聚散沉浮与荣辱盛衰，又往往同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哲学思想、伦理观念息息相通，并对当时和以后（包括以后世界的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风气以及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有着深刻影响。检阅这些聚散沉浮与荣辱盛衰，探讨其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剖析甚或解开其间形形色色而又饶有趣味的悬案谜团，不仅有益于增加知

识，提高素养，开阔眼界，丰富生活，而且对于从宏观上考察和总结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巩固和促进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乃至物质文明建设，亦具有积极的意义。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特组织一批在《四书》、《五经》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中青年专家撰写了“四书五经”文化风云丛书。丛书计划一套七册，每册二十余万字。每册分成若干板块，板块下又分门别类设立若干问题；以明白流畅的文字和漫游谈心的笔调，去向读者敞开《四书》、《五经》文化风云之门，引导读者进入它那层峦叠嶂、烟锁九重的神异天地；同时以科学的态度、冷静的思维来分析并试解或澄清相关的悬案谜团、疑云迷雾。

丛书以《三礼》取代《五经》中的《仪礼》，是因为《三礼》，包容了《仪礼》、《周礼》与《礼记》；而且《礼记》又包容了《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此外，丛书中的《春秋》还含《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七册书名分别为：

- 一、《诗经》之谜
- 二、《尚书》之谜
- 三、《三礼》之谜
- 四、《周易》之谜
- 五、《春秋》之谜
- 六、《论语》之谜
- 七、《孟子》之谜

引 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史官文化的显赫；而在史官文化中，《春秋》又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

据《孟子》、《史记》说，孔子之时，世道衰微，礼崩乐坏，臣弑君，子弑父，天下大乱。于是，孔子写作了一部一万八千余字的《春秋》（今本《春秋》一万六千余字），隐寓褒贬，来“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此来打击“乱臣贼子”。孟子曾经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按照礼制，褒贬诸侯是“天子”之事，孔子乃一布衣而行“天子之政”，似乎有越俎代庖的嫌疑。据说孔子自己也曾感慨地说：“后世知我者必以《春秋》，罪我者也必以《春秋》！”

但事实上，“春秋”是鲁国史官所记史书之名称，孔子不过是将其进行了修订而已，拿来教授弟子。孔子修订的这部鲁史（即《春

秋》)，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到鲁哀公十四年为止，按照年代顺序，共记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242年的史实，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编年史。后来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也是采用编年的形式，而且是接着《春秋》写下来的。

据说，孔子修订《春秋》时，从不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将褒贬隐寓在字里行间，这种“书法”就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遗憾的是，《春秋》经文过于简略，仅仅具有历史事件的纲目而无史事过程。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这种简略的记叙，相当于报纸的标题新闻，宋朝的王安石就曾讥讽其为“断烂朝报”。东汉学者桓谭早就感叹：这样一部《春秋》，如果没有详细的注释，圣人就是闭门苦思十年，也会不知所云。于是，在孔子死后，就陆续出现了几部解释《春秋》的著作，这就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实际上，《左传》不是专门为解释《春秋》而作的）。

《公羊传》相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著，此书以问答体的形式，逐字逐句解释《春秋》，来发挥所谓“微言大义”。如：“大一统”、“尊王攘夷”等等，董仲舒就是以《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来论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合理性。《穀梁传》相传为战国时鲁人穀梁赤著，据说他与公羊高曾同在子夏门下学习儒家经典。《穀梁传》体例与《公羊传》相似，也是以阐发“微言大义”为特点，但比较审慎，主张“为尊者避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等等，在汉代也曾一度是官学。《左传》相传为春秋末鲁国史官左丘明著，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大大值得怀疑。旧以为《左传》是为解《春秋》而作，其实，《左传》原来是一部相对独立的著作，后来才被用以解释《春秋》。《左传》注重记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所以深受学者喜爱。西晋名将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在戎马倥偬之际总是随身携带一部《左传》，最后将其心得编为《春秋经传集解》，以为孔子修《春秋》是代王立法而称“素王”，左丘明阐明《春秋》之法，实为“素臣”。从此，《左传》的地位迅速提高，到唐代遂与《公羊传》与《穀梁传》同时升格为“经”，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有今古文经学之区别。一般人认为：《左传》属于古文经学，而《公羊传》与《穀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在汉代，三派学者之间曾有过激烈的论争，人称“《春秋》三传”的今古文之争。传统看法认为，汉代今古文的划分，一般说有三个标准：一是经书的来源，二是传授的方式，三是师承关系。今文经原是孔子之后诸生言传口授，后渐渐著于竹帛，其字体多采用隶书，故称今文。今文传于官府，注重发挥，师承关系明确。古文经为民

间所藏，传于地方郡国，其字体多为籀书，故称古文。在传授过程中，古文经师谨守经文，就经解经，师承关系不明。相比较而言，今文经学注重思想，关注政治；而古文经学则注重知识，关注学术。两者对中国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

西汉末年，今文经学与宗教迷信逐渐合流，形成了谶纬之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春秋》的解读就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于是便出现了关于《春秋》的许多纬书，人称《春秋纬》。《春秋纬》充斥着有关孔子及其《春秋》的“神话”，这是儒家学派从“百家”之一而摇身变为国家宗教的重要一环。它为后代学者们留下了许多说不清的话题。

著者

2001. 3.

目 录

引言

一、说不尽的《春秋》	(1)
《春秋》究竟是不是孔子所作？	(1)
对孔子修《春秋》的质疑有什么根据？	(6)
《春秋》为什么如此取名？	(9)
《春秋》记事是否可信？	(11)
鲁《春秋》何以优于其他诸侯国史书呢？	(14)
《春秋》记事为何始于鲁隐公元年？	(17)
《春秋》的“微言大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2)
《春秋》是否字字都有“微言大义”？	(27)
《春秋》之“笔法”仅仅是“曲笔”吗？	(29)
《春秋》的典范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32)
《春秋》中之“零”是怎么一回事呢？	(34)
如何理解《春秋》中的“人”？	(38)
《五经》的次第为何有不同的排列？	(41)

二、文辞繁富的《左传》	(45)
《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	(45)
《左传》中为何有解经之语？	(50)
《左传》“解经”有几种表现形式？	(53)
《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呢？	(57)
《左传》是不是吴起所作？	(62)
《左传》为子夏所作的根据是什么？	(69)
《左传》是不是刘歆的伪作？	(72)
崔适证明《左传》伪作“七大证据”是什么？	(77)
《左传》成书于刘歆之前有什么证据？	(80)
《左传》怎么能“抄”《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呢？ ...	(85)
《左传》与《国语》到底是什么关系？	(95)
《左传》与《国语》是否出于一人之手？	(100)
左丘明究竟是什么人？	(103)
《左传》为什么应该是鲁国人的作品？	(106)
高本汉对《左传》出于鲁人之手的质疑	(109)
《左传》记事的史料有哪些来源？	(113)
《左传》成书于何时？	(116)
汉人所见《左传》是从何而来的？	(127)
为什么成书较早的《左传》迟迟登不上太学之堂呢？	(130)
《左传》的人物描写艺术	(135)
《左传》与《国语》在文学特色方面有什么差异？	(141)
《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表现在哪里？	(145)
如何理解《左传》中人们对于《诗经》的“断章取义”？ ...	(156)
三、显赫一时的《公羊传》	(166)
究竟什么是《春秋》三传的今古文之争？	(166)
《公羊传》的师承关系如何？	(169)
董仲舒为何大力倡导公羊学？	(172)
《春秋繁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78)
何休与郑玄经学之争的背景是什么？	(182)
公羊学派“大一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186)
什么是《春秋》的“三科九旨”？	(191)

什么是公羊学派的“三世说”？	(194)
什么是《公羊传》的“四讳”理论？	(199)
为什么至成帝时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	(204)
究竟该如何理解公羊学派的变通思想？	(207)
《春秋》决狱是怎么回事？	(212)
如何理解《公羊传》中的复仇观念？	(216)
《史记》受到《春秋》公羊学派的哪些影响？	(222)
四、清新婉约的《穀梁传》	(230)
《穀梁传》的作者是谁？	(230)
《穀梁传》属于今文经还是属于古文经？	(233)
《穀梁传》解经时如何运用避讳法则？	(238)
《穀梁传》是如何阐述经文之义例的？	(242)
《穀梁传》有哪些训诂学价值？	(246)
《穀梁传》中为什么时有引用《公羊传》之处？	(249)
为什么说《穀梁传》的风格是“清而婉”？	(252)
五、神秘莫测的《春秋》纬书	(256)
什么是讖纬之学？	(256)
各种《春秋纬》之书名究竟是什么意思？	(263)
讖纬之学与公羊学派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	(268)
《春秋繁露》与讖纬之学的关联表现在哪些方面？	(275)
《演孔图》是如何神化孔子的？	(281)
《春秋纬》出现的文化历史意义是什么？	(286)
结语	(290)

一 说不尽的《春秋》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桩非常重大的公案——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而其中，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尤其引人关注。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尊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不过，也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那么——

《春秋》究竟是不是孔子所作？

《春秋》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全书约一万六千多字。《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计 242 年，以鲁国为主体，兼及他国。它按鲁国国君“十二公”（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的顺序，分年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是后代编年史的滥觞。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桩争论了近两千年的公案，即孔子与《春秋》的关系。

旧说，《春秋》是孔子根据《鲁春秋》修订而成的。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引孔子的话说：“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史记·太史公自序》还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又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司马迁又说：“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司马迁是景仰孔子的。在整个《史记》里，征引孔子的地方非常多。可以说，司马迁是将孔子视为唯一可以印证的权威。他自认为，自己的《史记》就是在继续孔子“作”《春秋》的事业。因此，他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个美丽的文化故事。

其实，最早提出关于孔子作《春秋》之说的，是孟子。

《孟子·滕文公下》：“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对于这种说法，汉儒是没有疑义的。《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

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志善。’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然而，《春秋》记事过于简约，离开了论本事的“传”就不能使读者了解它的意义。因此，王安石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曾巩《南齐书目录序》也称其“散绝残脱”，今人周予同《群经概论》也认为“《春秋》一经，阙文阙义，殊不易研究”。难道孔圣人就只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吗？

这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在《论语》中，没有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商君书》，极力攻击儒家的“诗、书、礼、乐”，却没有攻击《春秋》。孔子作《春秋》之说，最早见于《孟子》，而战国诸子除《孟子》外，没有任何一部书提到《春秋》为孔子所作。

先秦文献表明，《春秋》是我国奴隶制时代一定时期内对史书的通称，许多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国语》中明确记载，《春秋》是贵族所讲授和学习的内容之一。《墨子·明鬼下》记载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另外，墨子还自称“吾见《百国春秋》”。（见《隋书·李德林传》。今本《墨子》无此文。）

本世纪初，在疑古思潮的推动下，有人开始公开怀疑孔子的著作权了。1925年，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春秋》“决不是孔二先生做的，孟子书中‘孔子作《春秋》’之说，只能认为与他所述尧、舜、禹、汤、伊尹、百里奚底事实一样，不信任它是真事。孔丘底著作究竟怎样？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

从先秦文献来看，孔子“作”《春秋》之说是不能成立的。